

澳門音樂學家戴定澄學術經歷、觀念與成果評述 ——兼論專著《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

簡巧珍*

摘要 本文以澳門音樂學家戴定澄學術經歷、觀念與成果評述為主軸，兼及其最近出版之專著《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為論述重點。文中前一部分為對戴定澄生命歷程、藝術學習與學術成就的梳理，指出其學術成就中所散發出的文化關懷，及兼具民族音樂學、音樂史、新音樂、音樂交流史、宗教發展史、社會學等跨領域的學術論述、學術視野，在華人學術界堪稱異數。其次是有關戴定澄新著《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的評析，認為是繼其《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和形態》《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等影響廣泛的專著之後，令人驚艷的又一部力作。進而指出戴定澄教授於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的開拓性研究，以及西方音樂早期多聲部音樂方面之豐碩研究，不僅為其個人成就，亦為澳門人文學術研究及華人西方音樂史研究的寶貴財富，是澳門專業音樂發展的重要成果。

關鍵詞 音樂學家戴定澄；澳門城市音樂學；歐洲十六世紀音樂；音樂學術研究

澳門音樂理論家戴定澄教授有關西方音樂早期和聲研究的最新成績報告書《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已由美商 EHGBooks 出版公司出版並向全球發行，這是他繼《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和形態》（2000）、《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2008）、《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2013）之後，令人驚艷的又一部力作。眾所周知，時至今日在西方音樂學術界，以巴洛克時期之前音樂做為研究主題的成果，原即相對有限，不少著名音樂史書於該年代的發展敘述，也多半停留在口頭語言當中，少有豐富音響與譜例參考。

可以想見，以一位中國音樂學者的身份去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更是難上加難。然而，戴定澄教授的著作於此方面的展現，卻突顯了脈

絡分明，內容極為生動、翔實。克服各種研究限制上的困難，以大量早期音樂樂譜、唱碟和文獻為基礎，其研究內容建立在鮮為人知的資料、豐富譜例分析及論證成果之上，不僅對於和聲形態與演化過程能提出具突破性的觀點，於時代作品的寫作技巧、藝術風格到文化背景也都有着充分的論述。代表作《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和形態》《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等，以及相應多篇發表在大陸、歐美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學術文論，不僅在中國境內被視為系統論述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演進的經典，在國際間也倍受矚目。

然而，當我們將他定位為聚焦於西方早期和聲研究的學者專家之際，他一系列以澳門為主題的著作，包括《音樂創作在澳門》《音樂表演在澳門》《音樂教育在澳門》，《澳門音樂記事 2004-2008》《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含中文版、英文版、及歐洲翻譯出版的葡文版）《澳

* 簡巧珍：音樂學博士，台灣藝術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門音樂簡史》，其中散發出的文化關懷，兼具民族音樂學、音樂史、新音樂、音樂交流史、宗教發展史、社會學等跨領域的學術觀點，讓人不得不對他的學術視野與治學毅力感到佩服與好奇，在華人學術界堪稱異數。

身為他在學術界志同道合的好友，我寧願回歸到頗能享受音樂演奏、創作、學術研究及相應教學的樂趣，對音樂充滿熱誠和悟性，卻又在人生關鍵點上常有着異於常人的選擇與投注，原汁原味的“戴定澄”。透過對他生命歷程、藝術學習與學術成就的梳理，期能使讀者得到啟發與共鳴。

一、楔子

戴定澄 1957 年出生於上海，為家中的幼子。由於父親及兄姐都喜愛音樂，兒時即深受音樂薰陶，尤其是受善奏多種中西樂器的二哥影響，八歲由其啟蒙，九歲後開始隨不同音樂導師學習。由於充滿對音樂熱誠和情感，琴藝日增，於初中一年級時（1970 年），考入當地區域合作的頗具規模的中學生合唱團擔任鍵盤伴奏。在合唱團中，並受到指揮家老師最初的音樂理論知識教導，不僅為日後的音樂學習奠定基礎，也開始萌生以音樂為學習目標的志向。

此時，正處於大陸“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年代，戴定澄雙親受到衝擊，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資本家”，身為子女者自然也得不到公平對待。所幸對於音樂的熱愛，使得他可以將注意力轉向，全心投入理想中的音樂追求。然而，1970 年代的大陸，西方音樂樂譜和音響資料是不可公開出版和流通、演奏的。學習西方經典音樂的方法之一，便是仰賴“眼看手抄”——有幸借到一本西樂琴譜，就得即時把握時間抄錄；此外便是“耳聽手記”——在老師為你借到又大又重的磁帶錄音機和一些難得的演奏錄音磁帶時，必須反覆聆聽以記下樂譜。如此功夫，不僅養成了日後快速讀譜的能力，也練就了一副辨別音樂不同因素的好耳力。尤令戴定澄感念的，是當年的老師（也是受到政治

衝擊的對象），在這一段教學過程中，既不收分文，也不計時間。在特殊的年代將音樂教學視為人生享受，將學生視為人生知己，師生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讓這一份特殊而深厚的情誼延續至今。

1974 年中學畢業（當時的中學為四年制），被安排至工廠的技術學校。作為工人的一員，因着音樂上的才藝，隨即被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和上海市滬東工人文化宮聘為藝術團成員，也時常為專業團體“上海樂團”的歌唱家們伴奏。大量的音樂會排練以及舞台經驗，為戴定澄積累了豐富的樂感，也藉此接觸了不少當時優秀的音樂家和指揮家，更結識了不少因政治運動下放的專業院校的國內一流教授，有機會經常請教，從中養成了作曲的愛好，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寫作了不少重唱、合唱、樂隊合奏曲，每次表演均佳評如潮。之後，作為音樂青年，更被指派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由一批著名教授組成講師團的“音樂培訓課程”，課程包括陳銘志教授的複調系列、江明惇教授的民歌系列、王久芳老師的歌曲寫作系列等。對於求知若渴的青年音樂人而言，無疑是久旱逢甘露式、獲益極大的經歷。

1977 年大陸恢復高考制度，當一起共事的藝術團團友們紛紛於第一、二屆即考入了音樂專業院校之際，戴定澄本人對於更上一層樓的學術進修卻仍未“醒悟”。他仍然“不動如山”，執意於投報當時音樂水平一流的部隊文工團以一展抱負，卻因為家庭出身並非紅色工人階級而受挫折。在有所“覺醒”決定報考大學時，已二十四歲（1981 年）——傳聞超出音樂學院的報考年齡。於是投考上海除了音樂學院之外唯一有音樂系科、原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舊址上建立的上海師範大學音樂系，並以優秀成績入學。

進入上海師範大學音樂系之後，因為品學兼優，每年均被評為全體音樂系學生中唯一名額的上海市級的優秀學生。同時，創作激情也日益高漲，並屢有佳績：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

美術與音樂

所創作的女聲二重唱《祖國，可愛的祖國》，即為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著名的“每周一歌”節目選中，於一週內每天多次反覆播放和教唱。在媒體並不發達的當時社會，影響頗大，對戴定澄而言，亦倍感榮耀。大學二年級時所創作的三聲部女聲合唱曲《春雨》，以鮮明的音樂形象、豐富的和聲色彩和多聲部織體結構形式獲得青睞，在上海市音樂作曲比賽中，與上海音樂學院的一組合唱作品並列獲得一等獎項。其時在上海的多家報紙皆有顯著的報導。此外，他還頻頻在校舉辦或參加個人作曲、作品音樂會，成果不僅斐然，而且頗受社會各界關注。

由於作曲的才能引起系領導的關注，在大學二年級時，學校破例讓他在完成上海師範大學音樂系課業的同時，得以赴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系統學習作曲四大件（和聲、複調、曲式、配樂）。此事對其而言自然是件好事，因為等同於同時研修兩個專業學位，但他也因此需完成大量作曲功課，包括每週不少於六題十六小節的各類對位題，以及相應的和聲、曲式、配樂法等題目。此外，學校也安排了資深作曲導師陳松齡先生指導作曲主課。在此基礎上，他創作熱情大增，又寫作了小提琴與鋼琴《隨想曲》（獲得上海市作曲比賽第二名）、奏鳴曲《山魂》（中國音樂家協會二等獎）、《樂隊前奏曲》（當年大陸著名搖滾樂隊委約）等作品。由於其音樂成就如此非凡，所以為學校管弦樂隊編配總譜，成了戴定澄學生時代的當然義務，也是他受到學校肯定的證明及殊榮。

1985年本科畢業，獲得該年度該系唯一的“上海市優秀本科畢業生”獎項。此後，為着有更多的演奏實踐機會，戴定澄允諾當時風行一時的上海舞廳擔任樂隊領隊兼任樂隊雙排鍵和鋼琴樂手，也應聘在酒吧彈奏鋼琴，應邀為一些樂隊配樂。這一段時日靈活的演奏經驗和寫作實踐，與戴定澄日後專業教學和科研的關係，有着一定的參考和互補作用。

此時他也逐漸萌生往教育發展的職志，留校擔任助教。為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教學技能，

他以助教身份再入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進修兩年。此後三次被評為年度“上海市高校優秀青年教師”。所任教的“鍵盤和聲”科目，由於教學聲譽良好，被時任安徽文藝出版社的音樂編輯蔡正箏女士邀請在教學大綱基礎上寫作《鍵盤和聲與即興彈奏》一書，該書1989年完成，1992年出版，並在1993年全國首次召開的“鍵盤和聲與即興彈奏研討會”上被評為“優秀著作”，之後曾三次再版，十數次重印。

二、赴日留學·返國讀博

1994年2月，戴定澄決定赴美國攻讀作曲碩士學位。就在業以先期被美國部分音樂專業院系認可接受，只待“托福”（TOEFL）國際英語考試成績和經濟擔保書（當時中國大陸的收入情況是不可能擔保在國外生活的開銷的，故一定要尋找國外親朋擔任經濟擔保人）補齊之際，卻因緣際會，由於藝術家朋友的推薦和日本教授的盛情（由教授主動擔當經濟擔保和在日本先期簽證，俗稱“倒簽證”），選擇前往日本國立靜岡大學（Shizouka University）音樂學部，跟隨着名講座教授須貝靜直（Shizunao Sugai）先生學習作曲理論。當時只有匆匆三個月的日文學習基礎，所幸教授允諾用英文溝通，然而抵達日本之後，教授還是建議最好以日文溝通和寫作。

嗣後得力於全日語的生活環境因素，加上堅毅的學習意志，戴定澄在繁忙的專業學習中，很快地適應了日語的學習。兩年後，並在教授指導和鼓勵之下，以兩萬餘字日文書寫的論文《初期多聲部音樂中的雙音原理》（《初期多聲音中における雙音原理について》）公開發表於日本的國際學術刊物上。對他而言，在日本研修的最大體驗，就是嚴謹細緻，尤其是對研究主題之研究史的預研究之重視。

1996年夏，為了進一步深造，在導師須貝靜直教授建議與熱誠推薦之下，他原已擬定赴歐美攻讀博士。此時，獲悉上海音樂學院前院長、著名作曲家桑桐教授準備招收一位作曲理

論的博士研究生（其時上海音樂學院直屬國家文化部，文化部共下達三個招生指標，而作曲系只得一個名額），因久已有專從桑先生學習的願望，於是下定決心回國報考。在連過幾關的考試之後，戴定澄有幸被錄取，成為當時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唯一的博士生（也是當時中國大陸所有音樂學院中唯一的作曲理論博士在讀生），如願追隨他敬仰的桑先生展開三整年博士課程的研讀。

三、博士學習的日子

身為作曲家與音樂理論家，桑桐先生在此專業上着墨甚深是眾所周知的，他也是中國運用無調性作曲技法創作的先驅，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即創作了以現代技法寫成的《夜景》（*Night Scenery*）、《在那遙遠的地方》（*From Far Away*）等先鋒作品，深受各界矚目。整整三年戴定澄親炙桑先生一對一的指導、教誨，對於老師那嚴謹、深邃的洞察力和充滿睿智火花的觀點，尤其是言行舉止處處透出的大師品格和風範，感受尤深，讓他有機會對老師有了非常人所能及的深切認知。根據戴定澄憶述，他在日本研修期間，曾公開發表了一篇兩萬多字關於歐洲早期多聲音樂的論文，而桑先生第一次上課，就與他詳談這篇文章，着實讓他相當驚訝。原因有二，其一，是先生對他在日本的學習情況竟然會有如此仔細的了解；其二，是桑先生熟識西文，卻也能閱讀日本文論。後來從先生經常提供給他分析的來自歐美和日本音樂界寄給他的最新現代作品樂譜和相關資料，戴定澄才深深得知，桑先生一直與國際音樂學術界保持着良好的溝通，在國際音樂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桑先生上課前的準備工作一向律己甚嚴，而且經常一討論就是整個下午。自從收戴定澄作為博士生弟子後，在自己繁重、深入的學術研究之同時，仍然全神貫注、一絲不苟地指導。可以說，在戴定澄三年就讀期間，桑先生真正是採用“貼身式一對一”的精心指導，而且為保證足夠的精力，此後也未再招收博士學生。

如此的真摯、厚愛與嚴謹之情，戴定澄至今仍點滴在心頭，這份無可複製的學習經驗，也成為他音樂生命中珍貴的篇章。

在專業的養成上，由於桑先生關注每一時期不同作曲家不同作品樂譜中反映出來的各種技術因素，以及這種技術因素與之前、或與同時期其他作品，及對後來作品的傳承、影響、演變關連。探討一些技術性因素時，也要求一定直接在鋼琴或人聲的實際音響上進行論證。促使以《歐洲九至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中和聲的理論與形態》作為論文题目的戴定澄，在歷經如此密集式的分析、考證和綜合的深入體驗之訓練過程之後，時至今日，當聽到國內外音樂界相對深入了解不足的歐洲十六世紀之前的音樂，或看到這類樂譜時，即使未知作曲家與寫作年代，也基本上能立即分辨出作品的年代與創作風格。而在這種音樂本體的基礎上構建出的線索，結合不同時期的理論觀念，就構成了豐富、實在的音樂演化史。

桑先生也非常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在戴定澄業已確定論文的主題時，先生便指導他對相關範疇的史料研究，尤其是西方原版著述和第一手的樂譜資料進行盡可能詳盡、深入的預研究——而對這些資料的考證、比較，尤其是對作品的技術分析，也隨之一併進行。於此，桑先生不僅提供了大量書目線索，甚至贈送給戴定澄他自己保存的不少西文著作，而這些著述上大多都有先生通讀時的旁註。戴定澄從國內外尋回的資料，也一定會同時給先生副本，先生都會逐一提出意見，共同討論。桑先生對戴定澄的身教、言教，經師、人師，可說是莫此為甚，每憶及曾歷經如此亦師亦父的互動，總令戴定澄感懷至深！

在桑先生悉心指導之下，戴定澄所撰述的博士學位論文，在答辯之前，部分內容已經被中國的音樂學術核心期刊《音樂藝術》分六期、以六篇相對獨立的論文形式發佈，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1999年6月，博士論文答辯會由國內最具權威的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包括錢仁康、

美術與音樂

桑桐、陳銘志、童忠良、楊立青、何訓田、沈璇等教授，論文在一致通過之餘，也獲得極高的評價。該著作也成為上海市學位辦公室頒布的研究生論文獎當中，唯一的藝術類論文。

四、“澄”就於滬·落腳澳門

戴定澄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在於上海師大音樂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學術研究並展開國際交流。2000年，應邀以音樂學者的身份，訪問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音樂學院，同時考察了芬蘭的大學音樂系，發表學術演講。2001年，以有關歐洲早期音樂的研究成果獲得肯定，受聘前往英國紐卡素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音樂學院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在職位上，他於2001年開始擔任上海師大音樂學院首任院長，2003年並以上海市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研究生學科領頭人的身份，應邀前往澳門，於公立澳門理工學院轄下的藝術高等學校（相當於藝術學院，也是當地唯一一所具備高等音樂學位培養權的學校）擔任校長。身為澳門音樂最高學府的領導人，出於學者的敏銳與責任感，戴定澄隨即展開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的關注與研究，開創了該領域的研究新面貌，成果斐然。

五、樂於接受挑戰的人生選擇

用美國著名現代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Keynes）的名言“習慣形成性格，性格決定命運”，對照毅力堅強習於接受挑戰的戴定澄來看，似乎言之成理。戴定澄的人生經歷極為豐富，同他願意嘗試新事物，時時做出世人通常難以做出的富於挑戰性的人生決定有關，以下試舉幾例：

事例一、當初決定去美國留學，亦已獲得美方學校許可，但由於八十年代所存在的經濟擔保困難，相對之下，由於日本教授主動作經濟擔保並全程代理日本國簽證，在完全沒有日文語言基礎的狀況下，他竟然允諾赴日留學。

而且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在教授的悉心指導下，竟然已可以運用純熟的日語，在日本學術界以日文公開發表兩萬餘字的學術研究論文（即便對於日本的資深學者，要在國際社會承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也絕非易事）。

事例二、正當在日本學術生涯漸入佳境時，因為嚮往追隨具國際聲譽的作曲家桑桐先生學習，毅然放棄在日本發展、或由教授親薦赴美深造的可能，毫不猶豫返回國內，報考當時全國只有一個名額的作曲系和聲方向博士研究生，並有幸成為桑先生的唯一博士研究生。此舉其實是為戴定澄當時在日本的朋友圈中，視為不可思議的決定。事實證明，他不僅因此取得豐盛學習成果，更為之後的人生學術道路做了非常踏實的準備。

事例三、在上海得到音樂界公認地位（在一流音樂家雲集的上海擔任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音樂家協會音樂理論委員會主任，以及在包括百多位專業教師的上海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擔任首任院長、研究生學科領頭人等職位，以及國內多家音樂院校的客座教授），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他毫不猶豫地決定接受邀請前往澳門擔任公立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的校長，如此劇烈的角色變動，對其而言不啻為人生最大的挑戰。原本完全不明白廣東話（粵語）的他，到了澳門三個月之後，便可以開始用簡單的粵語與人溝通。不到幾年，已經可以流暢地用粵語上課、演講以及交流。戴定澄認為這不僅是融入當地文化、方便研究工作的需要，也是尊重在地文化的一個基本表現，從中也能更好地體驗和理解當地文化，享受生活樂趣。他也就此展開澳門音樂與文化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引起澳門學術界的關注，不僅被邀請擔任政府文化諮詢委員（唯一的音樂代表），也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和外事部委員。2013年，由於對澳門文化的傑出貢獻，被特區政府授予文化功績勳章。

事例四、在澳門理工學院通常可以較為長期續任的校長職務任上，為了更專注於學術，

將有限的精力更多使用在學術領域，2010年毅然辭去校長一職，以資深教授身份專攻學術。此舉在當時引起領導和同事的不解，但隨後的大量學術成果，以及被聘為特區政府文化委員、被授予政府文化功績勳章的事實，又證明了該選擇之後可以做出更多個人學術貢獻和成就。

事例五、由於所服務的大學並無帶薪學術研究假制，為了有更多學術上的自由時間可以自如掌握，2017年度，又提出申請無薪學術假一年，這意味着戴定澄寧願放棄豐厚的薪水，也要投身於學術，享受文化的熱情和魄力。而這一年，毫無疑問，是他學術成果豐碩的一年。

據戴定澄2018年返回學校的報告中獲知，這一年的學術收穫包括：

(一) 主持的中國國家文化部重點項目之一《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澳門卷》在終審通過並獲高評之後，在該年度歷經兩次出版前的編輯校審會議，進入出版程序。

(二) 專著《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研究》(含中、英文)由美商EHGBooks微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全球發行，獲得華人音樂界包括本地、中國大陸和台灣(如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上海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台灣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等)在內的音樂專業界熱情歡迎。

(三) 專著《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在分別出版了中、英文版後，由葡萄牙學者翻譯，并由歐洲學術出版社Edicoes Colibri於2018年初正式出版了葡文版。

(四) 主編的《澳門本土鋼琴作品》唱碟在香港和本地正式印製出版。

(五) 學術論文四篇分別發表於：

1. 《十六世紀俄羅斯多聲部音樂：聲部型態與和聲方式》(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

術》，中國音樂界權威核心音樂學術期刊之一)；

2. 《十六世紀葡萄牙多聲部音樂研究》(《文化雜誌》2017年，澳門文化局主辦著名學術期刊，作為該刊100期大慶主打論文刊登，現正由葡萄牙COLIBRI出版社籌備翻譯出版)；

3. 《澳門作曲家秦啟志和他的鋼琴作品Min Onmin》(《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二十卷，2017年第3期)；

4. 《夏里柯及其澳門關聯作品》(廣州《星海音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六) 研究課題《澳門民俗與儀式音樂研究》於2017年10月獲得澳門政府文化局學術獎學金項目批准，在五位全球徵召項目獲得者中排列第一。無薪假期間項目已經初步完成資料工作。

(七) 所承擔的澳門理工學院兩個研究項目(題略)，分別獲得學院批准結項通知。

(八) 還充分利用了假期，於該學年度以較充裕的時間分別訪問了希臘、俄羅斯、日本、美國(兩次)等地及內地多個城市，考察了當地音樂文化，尤其是東正教音樂文化，收集了大量音樂、文字材料。

以上僅是戴定澄一年學術無薪假的成果收穫，看似“有價”(放棄資深教授的豐厚年薪取得的學術成果)，實為“無價”。

在學術上“做自己喜愛和享受做的事，做具有真正價值的事，做他人難以做的事”的原則：在生活上“懂得放棄和樂於放棄一些浮華，以致獲得更多人生的自由境界和美好體驗”的理念，是戴定澄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出於對生活和音樂藝術的熱愛，戴定澄的這些具有挑戰性的人生決定，在“捨得”放棄一些眼前利

美術與音樂

益的寬闊視野下，其人生經歷也更豐富，在文化的享受中，作出一個學者對社會的貢獻。

六、戴定澄的學術成果與特質

戴定澄在較為系統完整的理解西方傳統音樂理論的基礎上，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特色：其一是由1994年在日本研修時即已開始並持續了二十餘年的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研究（公元九世紀至十六世紀），相應研究成果已經居於華人地區的領先地位；其二是2003年後起步的澳門城市音樂研究，不僅對澳門城市音樂做出眾所公認的貢獻，另有多篇英文論文、著述以及歐洲有關出版社正待翻譯出版的葡文專著，均已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以東方人的身份要從事西方音樂，尤其是歐洲早期音樂研究，其實是面臨資料匱乏、部分資料所存在的語言、文字上的障礙以及中國境內學術界在此領域中較為薄弱的研究狀況等客觀因素的限制，因此戴定澄在最初的研究階段，主要是依據幾個得以着手的線索與資料來進行，諸如：

（一）經過英譯或日譯的古歐語著作；

（二）早期多聲作品的現代譯譜；

（三）當代以英、日、中三種語言翻譯或著述的音樂史書籍，包括了音樂通史、相關的斷代史、理論專史、辭典條目中相關的理論著述等。

儘管研究的條件如是艱辛，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所公開發表的論文《早期多聲音樂中的雙音原理》，以及由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歐洲九至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中和聲理念與形態》，於和聲寫作的細部分析與演化過程都提出豐富的例證與突破性觀點，不僅填補了華人在歐洲早期和聲研究專著的空白，也普獲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具一定影響力。

於此之後，戴定澄順利地開啓他得以深入歐洲，直接取得更多寶貴資料的大門。2000年，當他應邀以音樂學者的身份，訪問瑞典、芬蘭的音樂學院時，便獲得熱情的東道主和個別早期音樂研究學者的全力支持，獲贈和購買了不少樂譜、唱碟和書籍。2001年，赴上海訪問的英國紐卡素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艾利克·可洛斯（Eric Cross）博士也是在得悉戴定澄有關歐洲早期音樂的研究成果後，專程邀請他訪問該院並在該院做研究。

最初的身份是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但是當戴定澄抵達英國之後，在學院建議之下，校長即正式發函以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身份聘請他，讓他能因此享有更多學校教授的學術待遇。在英國半年期間，他也同分別由音樂學院院長和表演系主任擔任總監的兩個早期音樂合唱團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隨團親身體驗了大量歐洲早期多聲音樂作品的排練和演出。此外，還同英國知名教堂音樂學者Kieran Fitzsimonszb博士領導的一個全男班聖樂合唱團合作，研究一些早期拉丁文聖樂作品。當從英國歸國時，還寄回並帶回了兩大箱自己購買的、或學者們慷慨贈送的早期音樂樂譜、唱碟和文獻資料。

對照早期音樂的研究，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已夠豐盈，然而，研究的過程，永遠伴隨着無邊的探索。在漫漫的學術路上，戴定澄亦曾透過渠道與比利時、法國、德國及俄羅斯、烏克蘭（亦包含了較多的東正教資料）等國的音樂家及教堂、圖書館等保持聯繫，也因此取得更多的學術資料。此外並以實際參與國內外的音樂相關活動，做為理論與實際的參照。成功非偶然，努力成必然，兀兀窮年並頗具文才的戴定澄，得力於早年所接受傳統嚴格訓練的音樂養成基礎，以及日後在東西方多國留學、研究、考察等的經歷，終得以兼容並蓄、開放統籌東西方音樂的精髓，並游刃有餘地運用於自己的研究領域之中。以《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為例，雖為“編註”之曲譜，卻是在採集不少翔實、生動和鮮為人知的

資料下，經細緻考證、比較、分析，所匯編成的包含五十部重要作品和四萬字文字著述的樂譜集，既有獨特的體例，並深具學術性，中國音樂學大家于潤洋教授認為，《合唱經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合唱曲選》誠然“為我國對西方音樂的了解、欣賞和研究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窗口”。朱建教授也認為該論著“為我們終於在本國國土上首次看到了研究歐洲古代音樂的專書”。這是何等珍貴的成就！

2003年，戴定澄正式到澳門工作之後，除了上述領域的著述之外，也同時進行與澳門城市音樂學相關的主題研究。主要是因為澳門雖然有着豐富的音樂文化歷史和傳統，澳門音樂學研究並沒有達到同音樂實踐相對應甚而相輔相成的地步，身為澳門本地高等院校的音樂學者，基於本能的學術反映與研究熱誠，他義無反顧地投入研究。首先完成並發表《音樂教育在澳門》《音樂表演在澳門》兩本論著，其內容除了反映澳門的音樂教育光譜與音樂表演的整體情況之外，其中不少真知卓見，更是為音樂教育政策的制定，音樂表演事業的推動，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專業錦囊。嗣後又接續完成《音樂創作在澳門》一書，該著作內容包括兩大主題：“藝術音樂創作在澳門”“宗教及流行音樂在澳門”。是經過爬梳有關史料、分析有關曲譜、傾聽有關演出、訪問有關音樂家，而寫出的澳門音樂文化綜述，為澳門本土音樂學術研究跨出歷史性的一步。他的研究，也逐漸喚起境內外學者對於這方面的關注，不少音樂學者，包括戴定澄所指導的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學生，陸續都有優秀的相關文論獲得境內外學術刊物發表。

本着鏗而不捨闡幽探蹟的研究精神，戴定澄復於2013年又推出巨作《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者與作品》。該書從作曲家與作品的角度出發，對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予以資料上的梳理，同時進行深入的技術分析和相應的美學綜合，最終以歷史（縱向）和國際（橫向）的視野進行歸納。既是澳門音樂史，也是一部融匯中西音樂交流史與音

樂人類學的重大研究。而經由抽絲剝繭所提出的不少歷史線索，也讓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脈絡有了更清明的理解。以西式新音樂的傳入為例，現階段我們一向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學堂樂歌是中外交流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本書提醒我們，處於澳門的聖保祿公學至少在1565年就有了音樂課程，可以視為中國土地上第一個西式音樂教育的源頭。澳門音樂從文化遺產角度看，是澳門非物質歷史文化的難得積累；從地區風格看，對周邊地區的藝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歷史價值看，它也是華人音樂史乃至中國音樂史不可缺少的資料文本。戴定澄的研究，將我們原有的中國音樂史視野，擴展到整個華人世界了。

雖然一部又一部有關澳門本土音樂相關著作相繼問世，戴定澄並不因此而滿足，他更帶着這些學術成果結合實際的表演將澳門的音樂文化往外推廣。以近期為例，2016年5月，應中國音樂家協會邀請和出資，他帶領澳門長虹中樂團二十多人分赴北京中國音樂學院、新疆藝術學院等地，在他舉辦講座的同時，由樂團演繹澳門本土音樂；2017年4月，他連同澳門鋼琴家及道樂團一行三十多人，再赴北京及西安，開展“澳門音樂家及澳門道樂團京陝交流展演”之旅。戴定澄並同時主持“西樂東漸與中樂南移：澳門本土鋼琴作品與五代相傳吳氏道樂”主題講座。由此顯見，戴定澄有關澳門的研究，不僅為全面的中國音樂史提供充實的史料，也讓澳門因為獨特條件而產生的文化藝術活躍而蓬勃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要從歐洲早期音樂或是具有多元歷史文化背景的澳門音樂研究當中，梳理出其音樂發展的歷史線索，其實都是相對艱苦卻又極富挑戰與歷史價值的工程，“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一向視音樂學術為重，卻又頗能享受研究樂趣的戴定澄，正以豐厚的研究實力和經歷，繼續拓展熠熠生輝的人生。

美術與音樂

七、關於戴定澄新著《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探究》的評析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是為世人所公認西洋音樂史上聲樂複調的黃金時期，這時期的合唱作品，無論從內容、風格、體裁、結構、節奏、織體、寫作方法等各方面，都體現出合唱藝術的經典意義，更是多聲音樂與聲樂藝術極為寶貴的歷史財富。在歐美，對該時期作品的探討、應用已成為音樂學領域研究的重要趨勢之一。然而在音樂史書上我們看到的還是以歐洲主流體系的發展為主。本書《十六世紀歐洲多聲部音樂探究》，戴定澄教授以共時性的角度，來探究俄羅斯東正教多聲（合唱）音樂作品，以及葡萄牙同時期的作品，着實令人好奇並具新鮮感。

作為早期多聲音樂的一個重要分支，俄羅斯東正教的音樂雖然產生時期大大晚於西歐同類作品，卻由於其作品的實證價值，而引人注目，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相對的，作為歐洲一部分的葡萄牙，由於文化、經濟發展的相對不平衡，其多聲部音樂同西歐洲蓬勃發展的音樂潮流相比起步較晚，數量較少，卻亦應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教堂風格無伴奏合唱音樂的一個補充和組成部分，是一個相對離“中心”稍“偏遠”地區多聲部音樂演化發展的縮影。這些因為遷移與演化不同所產生的現象，是本書所要探討的重點。最後以文藝復興的主流“歐洲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中的和聲觀念與形態”作結，既彰顯這一經典時代的發展，也為前二者同一時期的音樂提供相對的參照。

現今，在華人學術領域中，對於俄羅斯東正教音樂的認識極為有限，而在西方學者的一些重要音樂史論中，對十六世紀葡萄牙音樂狀況的描述也幾乎是完全空白，本書以此作為主題探討，提供豐富的譜例、分析、論述與推測，無疑具強大的開創性，於作曲實踐與西方和聲發展史的研究，並具啟發性。

全書共分為上、中、下三篇，以及兩個單元的附錄。各篇重要論述如下：

[上篇]：《早期俄羅斯東正教合唱曲中的聲部形態與和聲方式》

十六世紀俄羅斯東正教的合唱音樂，不僅反映了東正教、也反映了俄羅斯早期多聲音樂的成果，同時亦在一定程度上披露、顯示了早期單聲部音樂往多聲部音樂遷移、變化過程中聲部形態與和聲方式的演變規律。主要原因在於，較之西歐最初的多聲樂譜，實質為理論範例，很可能存在了更早的實例卻未能得知，東正教音樂保留了較為完整、最初線索比較清晰的歷史資料。

本篇歸納了十六世紀俄羅斯東正教的多聲（合唱）音樂作品中的三種表現（可概括為支聲式、依附式和對比式三類），實證的觀念尤其值得稱道，其價值在於以豐富的作品實例來說明早期多聲部的複調、和聲手法。前此，西方音樂史中多聲部現象多是理論歸納，缺乏如此豐富的實例。東正教的合唱音樂和聲方式，從調式背景、不協和音狀態、聲部進行與低音形態、終止式等幾方面來看，亦形成獨具一格、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諸如兩三個聲部的運動關係多數呈同向進行，與現代和聲教科書所強調的聲部反向便有所差異；不協和音的聲部關係堪稱大膽，或可視為對後來現代音樂的一直預示；歸納出各種中古調式其終止形式的運用，也是本篇章突出的一個特點。

[中篇]：《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多聲部音樂探究》

西歐多聲部音樂的起源，可追溯到九世紀法國北部的“奧伽農”，然而同法國教會在整個中世紀期間關係一直十分密切的葡萄牙，其多聲部音樂同西歐同時期蓬勃發展的音樂潮流相比，卻是相對滯後。本篇首先經由葡萄牙的歷史與文獻、西方音樂史脈絡，以及現實內相當有限的有關葡萄牙多聲部論著等等的抽絲剝

爾，對於這個史實的來龍去脈有精闢而中肯的論述。

繼之，選取十六世紀上半葉 F·G·科雷亞的《主創世界彌撒曲》（*Missa Orbis*）為例，對這部由葡國作者為彌撒常規經譜寫的最早的複調音樂版本，同時也是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屈指可數的聲樂複調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進行詳細分析。並將之置於時間（十六世紀上半葉的前期及後期成就）、空間（文藝復興同時期以西歐為代表的多聲部教堂合唱曲的理論觀念與作品形態）之中作並置性的比較，不難看出，F·G·科雷亞的這部《主創世界彌撒曲》，較程度上吸收了十五世紀下半葉佛蘭德斯樂派的作曲技術內涵，卻體現了嚴謹、古樸和簡約的特質，嚴格運用格里高利聖詠作定旋律的手法，並以多聲部中清晰的四聲部組合、短小及省略的樂章、自然音體系為主的調式及不斷被強調着的弗里幾安四音列、和弦式（類似主調式），為基本框架的織體，以及幾乎是源自十四世紀的“偽樂”方式等。

換言之，以作品的技術手法以及作者對大型彌撒作品的駕馭程度，同當時以意大利為中心的聖樂複調創作的盛況相比，該曲所呈現出的，大體而言，尚屬一個基礎性、階段性的表現，然而 F·G·科雷亞本人某些帶有個人特性的手法，卻相當值得關注。諸如，將定旋律放在低音聲部，是否為“帕薩卡利亞”的先兆，耐人尋味；聲部進行中的半音裝手法，源於調性的構成，而非為了色彩而作，也是有價值的分析；再者，中古調式旋律採用的多聲部手法，既有複調模仿，也有縱向和聲，為大小調式之前的多聲部寫作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譜例。那麼這究竟是 F·G·科雷亞本人獨特的思維，亦或是當時地區性的共性，就值得深入研究，不僅提升對於 F·G·科雷亞本人系統研究的必要性，也有助於將葡萄牙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作為“整個國際潮流中的組成部分”之區域性地位的理解。

[下篇]：《西歐十六世紀多聲音樂中的和聲觀念與形態》

下篇是從戴教授 2000 年出版的《歐洲早期和聲觀念與形態》一書，截取“文藝復興時期多聲音樂與和聲理論的發展”做為基本架構。十六世紀所相對應的文藝復興時期，根據其整體的調式基礎特點及其規範化的和聲狀態，正是被界定為多聲音樂中和聲觀念與形態發展第三時期的“調式和聲時期”，本篇主要從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與發展條件、音樂流派與風格特徵、主要音樂理論及其著述、音樂實踐與作品分析四方面進行分析、歸納，認為經過前幾階段充分準備和積累的多聲音樂創作，在文藝復興時期已呈根深葉茂之勢，無論在理論與實踐的涉及廣度上或是在內容與形式的表現深度上均已達到歷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高點。與此相應，從中結晶而成教會調式和聲的基本規範，與音程性和聲相對應的、以縱向規整和弦結構為主要特徵的和弦性和聲形態亦於其中形成規模，這亦是多聲音樂歷史的重要發展成果。

藉由豐富的具體譜例分析，我們除了更明晰地看到時代的規律性，篇中許多具突破性的研究觀點，也深具啟發性。以和聲的半音（不協和音）為例，在那個時代能有如此豐富的和聲半音例證，確實出人意表；對於變音和聲應用，儘管處於半音化的最初實驗階段，卻也透露其和聲語言的豐富。再者，戴教授對於和聲低音聲部的分類方法非常細緻，突顯獨特的思維與方法論，即使在現代和聲的教授當中，也缺乏這樣的分類方式，其對於創作的指導意義甚為明顯。

[附錄一]：《作者有關歐洲早期多聲部音樂表演的評論文》

書後有關“音樂會評述”“作者相關著述評價”雖為附錄，卻不失為本書獨特的亮點。前者雖然僅是戴教授在音樂會中聆聽有關早期多聲部音樂所寫的評論，但卻在文字上為我們帶來“行萬里路”以及“與歷史結合”的新鮮

美術與音樂

感。畢竟，至今為止，有關西方早期多聲部音樂於華人世界的音樂會中出現的機率，無論於中國大陸境內，或是港、澳、台等地都不算高，能以精準文字分析者，更是難得。這些評述，讓我們有親炙歷史的臨場感，在有關“西斯汀”合唱團一文中，僅於“西斯汀名單”，就令人感動。原來佛蘭德斯作曲家普雷（J. Pres 1450-1521）、羅馬樂派的領頭人物帕勒斯替那（G.P.d. Palestrina 1525-1594）、以牧歌著稱的瑪倫齊奧（L. Marenzio 1553-1599）、莫拉萊斯（C.d. Morales 1500-1553）等人，都曾是該合唱團當中的成員！戴教授也藉着東歐合唱團的演出曲目，深刻介紹有關傳統東正教音樂的特色與近代經典名作，包括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而對於我們而言，原來多半僅止於音樂史書上印象的法國聖母院學派（School of Notre Dame）、帕勒斯替那、朗迪尼（F. Landini）、拉素士（Orlande de Lassus 1532-1594）等人的音樂特色，更是生動、活潑地躍然於紙上。雖僅是“音樂會評述”，實則已是綜合歷史性、知識性與學術性的音樂導引。

[附錄二]：《學術界對作者歐洲早期多聲音樂著述的評述》

這是學術界人士對戴教授相關著述的評價與探討，其中不乏音樂大師，也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優秀學者。大師的經典筆墨，以及中青年優秀學者的真知灼見，早已超越了通常的書評要求範圍，更充滿了各家的睿智，是本書極其難得與珍貴的導讀文獻。對於拜讀本著作的讀者群們，深具參考價值及啟發功能。

